

文明与世界译丛

刘新成 刘文明

主编

文明及其内涵

CIVILIZATION
AND
ITS CONTENTS

〔美〕布鲁斯·马兹利什 著

汪 辉 译

刘文明 校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文明与世界译丛

刘新成 刘文明 主编

文明及其内涵

CIVILIZATION

及其

ITS CONTENTS

〔美〕布魯斯·馬茲利什 著

汪輝 译

刘文明 檄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明及其内涵 / (美)马兹利什著; 汪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文明与世界译丛)

ISBN 978 - 7 - 100 - 12230 - 6

I. ①文… II. ①马… ②汪… III. ①文明—研究
IV. ①G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01943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文明与世界译丛

文明及其内涵

〔美〕布鲁斯·马兹利什 著

汪 辉 译

刘文明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冠 中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12230 - 6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7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6 1/2

定价：28.00 元

CIVILIZATION AND ITS CONTENTS

**by Bruce Mazlish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2005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ww.sup.org.
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译出

总序

刘新成

从某种意义上说, civilization(文明)一词出现之初就是一个解释世界的概念,本套译丛以“文明与世界”为题,原因可能也在这里。

“文明”曾把世界切割为“昨日世界”与“今日世界”。据考证,最早使用 *civilisation*(相当于英文 *civilization*)这个词的是法国人米拉波(1715—1789),他曾指出,“文明”所指,并非某特定阶层的专有行为,而是一种本质性道德。同一时代的法国财务大臣杜尔哥(1729—1781)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弗格森(1723—1816)则把“文明”视为过程,即人的精神与行为逐渐发生变化。这些定义表明了“文明”的普适性和历史性,亦即解释世界的工具属性。19世纪,在进化论冲击之下,西方的基佐(1787—1874)和东方的福泽谕吉(1835—1901)先后发表专论,系统阐述文明的性质,即个人的精神发育和社会的秩序养成,二者都意味着进步,于是为文明理论建立了一种“线性—进步”思维模式,在这种模式之下,论者习惯于将世界各地不同人类群体按其精神与秩序的不同发展程度置于“文明阶梯”——法国思想家戈比诺(1816—1882)所说——的不同层级之上。高低不同,良莠有别,先进者属于“今天”,落后者则停留在“昨日”。当今人们用农业文

明、工业文明以及计算机文明或信息文明等为世界历史分期的时候，其实仍在沿用“线性—进步”文明观，只是采用了生产力标准。

文明也曾把世界切割为“自我世界”与“他人世界”。这种“切割”方式源于对“文明”的不同认识，即认为文明没有统一标准，可呈现出各种不同形态，而且各有其价值。这是一种按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分类的文明观，其起源可追溯到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将文明气质归因于地理环境；伏尔泰（1694—1778）高度尊重地方风俗——而总其成者则是19世纪的文化学者和社会学家。

19世纪欧洲社会危机频发，人们逐渐从“线性—进步”的幻境中清醒过来，他们不再盲目乐观，转而相信社会发展的“任意性”，相信前路多歧，选择才是最重要的，与其设想远景，莫若把握现实。于是社会进程研究让位于社会状态研究。在这一背景下，吕凯尔特（1823—1875）和涂尔干（1858—1917）等人提出，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有不同的需要以及与之相应的文化，文明呈多种类型并共同存在，每种类型都是独立的有机体，都有独特意义。他们认为，统一的“文明”只是一种空洞的想象，脱离现实，不值得深入探究，社会科学家应该关注现实文明，即同一民族在同一社会化过程中遵循同样的标准，并且形成同样的价值观，因之在共同生活中总能协调一致。简言之，现实的文明就是民族性。他们认为民族本性永恒不变，因此各个文明必是凝固的，彼此隔绝的，每个文明都是独立的“自我”，“自我”之外均为“他人”。civilization一词在19世纪出现复数形式，这标志着多元文明观的形成。这种文明观仍把世界“切割”开来，只是不按发展序列而是

按文明类型“切割”。

欧洲论者无论切割世界的方式如何不同，都认为世界最终必将走向统一，而统一的形式必是欧洲文明一统天下，20世纪备受争议的“欧洲中心论”由此而来。自我中心意识在欧洲由来已久。古典时代的希腊罗马人就自视高人一等，对“非我族类”一概以“蛮族”、“蒙昧、未开化之人”相称；从但丁（1265—1321）到格劳秀斯（1583—1645）、斯宾诺莎（1632—1677），历代先哲无不把“人文公民”（humana civilis）、“理想人格”等美誉赋予现实或未来的欧洲人，而为其他民族贴上“缺少教养”、“未脱自然状态”等标签。这样便形成近代欧洲人以“文明人”自居，鄙视“土人”，甚至如弗格森者流将中国和印度置于文明社会之外的心理基础。但“欧洲中心论”盛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近代以来欧洲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使他们认为有资格自居于“文明阶梯”的顶端，有资格以“优势文明”自诩，以致戈比诺得出了优秀文明只属于纯种白人的荒谬结论。这种把西方文明与世界其他地区对立起来的二分法是助长欧洲殖民扩张、海外掠夺、征服世界的重要文化基础。

20世纪风云激荡，世界格局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称霸一时的西欧诸国风光不再，而美国崛起谋求世界霸权；亚洲的觉醒改变了东西方力量对比，众多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取得国家主权，伸张发展权利；世界范围内经济交流日趋密切，全球化模式初步形成。变幻莫测的国际局势和民族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投射到理论领域，使文明研究这一高度学术性的话题在世界许多地方成为显学，以至联合国将2001年确定为“文明对话年”。

“文明研究热”在很大程度上仍围绕“欧洲中心论”展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踏上现代化进程。在现代化的浪潮中，社会发展呈趋同之势，地域性、民族性特点被不同程度地忽略和掩盖，“现代文明”似乎成为标准化的文明存在形式，大有统摄各类文明的趋势。在许多欧美人看来，现代文明是由世俗社会、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基本要素构成的，这些要素均来自欧洲传统，历史的发展印证了“线性一进步”发展观，人类社会终于按照欧洲人规制并践行的文明路线走到了终点。福山（1952—）认为“历史已经终结”，而当代英国历史学家弗格森认为终结的原因，是由于西方人将他们发明的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撒手锏”教会了非西方世界的人们，并被后者所应用。当下，这种欧洲／西方中心论的极端表现是“美国文化中心主义”。这种理论否认文化差异的创新意义，倡导世界文化同质化、统一化，而统一的范本就是当代美国文化。

显然，渗透殖民主义乃至种族主义的“欧洲中心论”势必引起世界各地被压迫民族的极大反感。非但如此，即使在西方学界内部，“欧洲中心论”也不断受到质疑和批判。批判的学理基础是从多元文明观推衍而来的文化相对主义。斯宾格勒（1880—1936）批评欧洲中心论是“历史的托勒密体系”，他说文化的本质是生活特征，不同的文化对应不同的社会实体，彼此之间不可通约，欧洲文明不存在同化异质文明的可能性，他呼吁欧洲放弃自我中心主义，建立“历史的哥白尼体系”。汤因比（1889—1975）则指出，所有文明在哲学意义上都是等价的，因为同原始社会相比，他们都取得了伟大成绩，而用人类理想来衡量，这些成绩都微不足道。

然而，无论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如何否认“欧洲中心论”，他们都认为哥伦布以后的时代是欧洲文明的时代，与其他文明相比，欧洲近代文明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因此他们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不可能贯彻到底。

更有力的批判来自文明互动理论。与文化相对主义相反，文明互动理论认为文化是可以相互融通的，不同的文明正是在交流互动中取得发展。此说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文明的进程》一书作者、社会学家埃利亚斯（1897—1990）。他说，从笛卡尔开始，西方学术就建立了一种自我中心的传统，把“思想着的自我”与“外部世界”两分，“自我”总是处在与他人和外界的对立之中，以致得出人类生活经验断无交流可能的错误结论。他说，每个“自我”都不能唯我独尊，社会的特点是相互依存，文明的习惯和秩序乃是相互学习的结果。20世纪中叶人类学提出“文化传播理论”，进一步解释了人类互相学习的机制。世界历史学科则总结人类生存经验，提出了文明互动学说。这些服膺“全球史观”的史学家，将世界视为一个整体，从高度宏观的视角审视人类整体发展历程，得出的结论是：即使人类历史存在不同文明，世界的发展也从来不是始于某个特殊文明的推动，历史前进脚步总是与不同文明之间互动相伴。“全球史学家”（global historians）认为，首先，从来不存在绝对孤立的文明，所有文明都是在与其他文明的共处中存在；其次，各个文明在共处过程中，或是因为发现他人的长处，或是因为迫于他者的压力，因而产生了学习的动机和发展的动力，所以历史车轮的推动者乃是文明互动。全球史学家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推翻了许多传统结论。他们指出，作为西方文明基础的所

谓希腊文明，并不是纯粹“西方”的产物，而是吸收了许多来自两河流域和古埃及的“东方”元素；近代早期“西方的兴起”也并非源于西方文明的什么“特殊素质”，而是美洲、亚洲诸多地区亦曾参与其中的商业网络互动的结果。“全球史”研究的方法和结论或可商榷，但它不仅彻底颠覆了欧洲中心论的根基，而且一反“切割世界”的传统，提出了全球文明互动、整体运行的理念，对人们更好地认识世界的过去与未来或许产生积极的影响。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巴里·布赞（1940—）在全球史观代表人物麦克尼尔的影响之下，力主国际关系学从“威斯特伐利亚束缚衣”（Westphalian straightjacket）中解脱出来，突破民族国家框架，从影响人类历史的诸多体系（如欧亚大陆体系、印度洋体系）和主要机制（即文明互动）出发重新思考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过程，重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他说，从文明互动的角度看，所谓国际体系乃是各民族国家内部社会体系的总和，国际关系研究亦属文明互动研究，因此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文明，远非传统的政治学所能涵括。

人类在地球上已经有 5000 年的文明史，在悠久的历史中积累了丰富的共生、共存、共荣的生活经验。然而迄今为止的文明理论和文明史，大多专注于文明的区别和分裂，互相争斗和倾轧，而忘记了人是群居的动物，人类社会本质是相互依存，忘记了各种组织形式的人类群体都在互动中不断成长和发展，忘记了物种的传播怎样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繁衍，而细菌、病毒的危害和环境的破坏带给人类共同的灾难，同时也忘记了在人类各个群体中分享着共同的价值观，对暴力、欺诈、偷窃和背叛的谴责同见于“摩

西十诫”、《薄伽梵歌》、《论语》和其他宗教或民族传统经典之中。这些“忘记”不能不说这是极大的遗憾和悲哀。

我们生活在全球化时代。如《文化帝国主义》的作者汤林森所说，全球化将削弱所有国家的文化向心力，经济实力再强大也不能幸免。面对这一“文化危机”，究竟应该像当代极端文化相对主义者那样，死守自身价值，强调自我中心，坚决拒斥人类利益与价值的通约性，将世界一步步导入“文明的冲突”，还是应努力构建入江昭先生所设想的超越国家主权、打破民族国家界限的康德式“文明共同体”？这在某种意义上将决定明天的世界。

在《风险社会及其超越》一书中，作者贝克指出，在当今交往日益紧密的“地球村”，人为制造的风险越来越大，其中包括理论造成的风险。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因其概念、理论、话语不断循环往复于研究对象而“自反性”地重构和改变研究对象。为了我们生活的世界能够规避风险，理论研究者有必要不断反思既往的文明学说，藉以塑造未来的和谐世界。我相信，这是本套译丛编者所期望的。

马兹利什和他的历史研究

刘文明 汪辉

布鲁斯·马兹利什(Bruce Mazlish, 1923—)是当代美国历史学家、麻省理工学院荣誉退休教授。他于1944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1955年在该校获得博士学位，随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工作，从事史学研究长达半个多世纪。马兹利什的主要研究领域有西方思想与文化史、心理史学及史学方法论、全球史，出版专著、合著、主编著作20余部，主要有：《西方思想传统：从列奥纳多到黑格尔》(1960，合著)、《心理分析与历史学》(1963)、《铁路与太空计划：历史类比视角的解释》(1965，主编)、《历史之谜：从维科到弗洛伊德等伟大思辨者》(1966)、《探寻尼克松：一项心理史学的研究》(1972)、《詹姆斯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9世纪的一对父子》(1975)、《基辛格：美国政策中的欧洲思想》(1976)、《革命苦行者：一种政治类型的演进》(1977)、《卡尔·马克思的意义》(1984)、《一门新科学：联系的断裂和社会学的诞生》(1989)、《第四断裂：人类和机器同步进化》(1993)、《全球史概念化》(1993，合作主编)、《不确定的科学》(1998)、《文明及其内涵》(2004)、《全球史读本》(2005，合作主编)、《利维坦：跨国公司与新全球史》(2005，合作主编)、《新全球史》

(2006)、《全球时代的人道观念》(2009)、《反思现代性和全球化》(2013)。此外，他还担任数家学术杂志的编委，其中在历史学界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与理论》和《跨学科历史杂志》，更是在他的推动下建立起来的。由于卓越的学术贡献，1986年他获得了“汤因比奖”(Toynbee Prize)。

从马兹利什的著作可以看出，他的研究领域虽一直以思想文化史为主，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却发生了变化。他从最初的心理史学转变到社会史、科技史，最后转向全球史，在坚持历史学基本方法的基础上，不断从其他学科寻找可借鉴的理论和方法，跨学科研究成为其史学研究的一大标签。

马兹利什的治史生涯始于对西方知识传承史的研究。1960年，他与雅各布·布鲁诺斯基(Jacob Bronowski)合作出版了《西方思想传统：从列奥纳多到黑格尔》，这是他的第一本著作。该书分析了文艺复兴直至19世纪初四百余年西方的思想传统，认为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思想传统是科学、自由和精神世俗化，^①这三大传统的运动史构成了西方四百年的历史。这本书出版后广受欢迎，在美国史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66年，马兹利什出版了他的独著《历史之谜：从维科到弗洛伊德等伟大思辨者》。在该书中，马兹利什的目光转向历史哲学，尝试回答一个谜，即人的历史意识产生之谜。这个谜包含两个问题：第一，人如何知道已发生过的事；第二，已发生的事有什么意义，其运行机制是怎样的。^②

^① Jacob Bronowski, and Bruce Mazlish, *The Western Intellectual Tradition : From Leonardo to Hegel*, Hutchinson, 1960, pp.491—497.

^② Bruce Mazlish, *The Riddle of History : The Great Speculators from Vico to Freud*, Harper & Row, 1966, p.1.

第一个问题涉及认识论和方法论，是“批判历史哲学”所关注的问题，而“思辨历史哲学”致力于回答第二个问题，并且就人类发展历程，提出一些解释模式、秩序、目的和推进机制。^① 马兹利什在书中选取数十位著名学者——维科、孔多塞、康德、黑格尔、孔德、马克思、斯宾格勒、弗洛伊德，以他们的思想主张来回答这两个问题，目的是要论证一个核心观点“历史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人的历史意识的形成和发展”。^②

1960年，马兹利什的婚姻出现一些问题，因而接受心理分析治疗。^③ 这件事情给他带来启发，于是他尝试以心理分析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历史研究。1971年，他与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f)以及罗伯特·里夫顿(Robert Lifton)合作编辑了一本文集《心理分析与历史学》，由此开始，马兹利什正式转向心理史学，随后在这一领域先后出版了几本著作。1972年，马兹利什首度尝试以心理分析方法来进行个案研究，写成了《探寻尼克松：一项心理史学的研究》。在这本书中，他分析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心理及其成长经历对其执政决策的影响。四年后，他再度以同样的心理分析方法来研究基辛格，并对当事人进行了采访，出版了《基辛格：美国政

① Jack Lively, “Review of *The Riddle of History : The Great Speculators from Vico to Freud*”,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83, No.327 (Apr., 1968), pp.439—440.

② Bruce Mazlish, *The Riddle of History : The Great Speculators from Vico to Freud*, Harper & Row, 1966, p.8.

③ Donald A.Yerxa, “From Psychohistory to New Global History : A Conversation with Bruce Mazlish”, *Historically Speaking* 5.6 (2004) : 2—7.

策中的欧洲思想》，阐述了欧洲和纽约的排犹环境对基辛格的成长经历、个人政治哲学、政治生涯的影响。

马兹利什的心理史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是1975年出版的《詹姆斯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9世纪的一对父子》，该书于1988年再版也说明这一点。这本书同样以心理分析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和约翰·穆勒（John Mill）这对父子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儿子约翰·穆勒的个人性情和思想主张的影响。马兹利什在书中着力回答这样几个问题：詹姆斯·穆勒是怎样一位父亲？约翰·穆勒是怎样一个儿子？他的母亲是怎样一个女人？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是什么样的？父子二人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①作者以这些问题为出发点，在寻找其答案的过程中，又衍生出其他许多问题，如为什么詹姆斯·穆勒在这个大儿子身上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培养他？这对儿子又产生什么影响？约翰·穆勒和哈莉特·泰勒（Harriet Taylor）这个他一生的爱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段关系和这个女子对约翰产生了什么影响？穆勒父子的故事如何反映维多利亚时代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模式？^②回答这些问题时，作者着重强调约翰·穆勒的俄狄浦斯情结，詹姆斯试图塑造儿子，使之摆脱自己的出身和阶层特性，但是儿子成年后，用余下一生大多数时间来反抗、摆脱父亲的塑造，然而却无法真正割裂与父亲的联系。通过回答这

^① Bruce Mazlish, *James and John Stuart Mill : Father and S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88, p.4.

^② Daniel Granger, “Review of *James and John Stuart Mill : Father and S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Victorian Studies*, Vol.19, No.2 (Dec., 1975), pp.288—290.

些问题，马兹利什还有一个意图，即以穆勒父子的张力关系来表现现代社会的代际变化。

1977年，马兹利什又出版了《革命苦行者：一种政治类型的演进》，在这本书中，他借用马克斯·韦伯的宗教禁欲理论和弗洛伊德的性本能理论来分析多位革命领袖的心理，如克伦威尔、罗伯斯庇尔、列宁和毛泽东等人，这些革命者是苦行者，他们压抑肉体的欢愉，竭力追求革命事业，建构意识形态，追求人民的爱戴，注重塑造个人领袖魅力等。这本书也有一定的反响，在政治学领域引起关注。

从1970年代至1980年代末，马兹利什在心理史学这样一个较为前沿的领域探索近20年，成果颇丰，但获得的肯定之声寥寥，这促使他反思心理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且开始改变研究方向。这样，他开始关注社会学中的一些问题。1989年，他出版了《一门新科学：联系的断裂和社会学的诞生》，从历史视野考察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社会学兴起的缘由和背景。这本书以“联系”问题为切入口，提出18、19世纪西方社会原有的联系（如教会、各种社群的联系纽带）在工业革命、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冲击下纷纷断裂，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神之间失去了联系，人成为孤立的个体，人与人之间渐渐只剩下“金钱联系”（Cash Nexus）。^①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者视原有联系的断裂为一种机会，是社会重组、新联系生成的一个契机，认为社会由此转

^① Bruce Mazlish, *A New Science : the Breakdown of Connections and the Birth of Soci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9.

型，个人主义将盛行起来，独立的个人将组成新的社会，这些学者包括亨利·梅因 (Henry Main)、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埃米尔·涂尔干 (Emile Durkheim)、格奥尔格·齐美尔 (Georg Simmel)、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费尔迪南德·滕尼斯 (Ferdinand Tönnies) 等，他们提出断裂带来自由和独立，催生新的“网状”(web)联系，由此社会学产生了。^① 马兹利什在这本书中以联系为切入口，通过分析众多学者对联系断裂的态度及主张，清晰地阐述了社会学兴起的过程及原因。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对该问题的阐释获得了较多的肯定，甚至得到了许多社会学家的赞誉。^② 这本书之后，马兹利什解释历史的角度中，除了科学、理性、世俗化、进步、进化等概念外，又多了一个“联系”的概念。在他后来的其他著作中，“联系”出现的频率极高，而且他利用这个概念去定义其他概念，如现代性、文明、全球化等，还以这个概念去建构其他新的概念，如全球文明等，这个概念成为他在社会学领域探索的最重要的成果。1995年，马兹利什以“联系”概念来分析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对人类的意义，于是出版了他的《第四断裂：人类和机器同步进化》。

马兹利什说，《第四断裂》这一书名的确定受到弗洛伊德的启发，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中提到历史上有三大发现打击了人类的骄傲，它们使人类的认知形成断裂：一是哥白尼的

^① Bruce Mazlish, *A New Science : the Breakdown of Connections and the Birth of Soci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xiii.

^② Donald A.Yerxa, “From Psychohistory to New Global History : A Conversation with Bruce Mazlish”, *Historically Speaking* 5.6 (2004) : 2—7.